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研究

— 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 —

高 文 强*

— <目 次> —

- | | |
|----------------------------|----------------|
| I. 引言—“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
研究之意义 | III. 新世纪研究之进展 |
| II. 上世纪研究之概况 | IV. 新世纪研究之评价 |
| | V. 结语—新世纪研究之展望 |

I. 引言—“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研究之意义

“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是一个学科交叉性课题，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并非热点。不过，这一课题之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而言，却是至为重要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六朝”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繁盛期，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收获期，发展趋向的叠合，使得佛教与文学批评在这一时期发生因缘实难避免。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近三个世纪的依附性传播，至东晋开始逐步进入士人文化行列，入南朝而成为士大夫间最重要之文化思潮，影响所及包括其时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士人心态等各个方面。六朝文学批评在批评史上地位尤重，郭绍虞先生曾总结说，此时讨论的问题，“空前启后”；文学批评的专著，“传至现代犹自成为空前的伟著”；“各种批评的方式殆无不备”；“此期的批评家才真是纯粹的批评家”¹⁾。一个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对这一时期文学

* 武汉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创作风气的回应；另一方面，它还常常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六朝佛教之于文学批评正是如此。因此，六朝佛教对文学批评影响的研究一直颇受一些现代学者的关注。20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被不断开拓和深入，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课题的研究有何新的进展？有何新的开拓？存在何种问题？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回顾与反思，对今后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必多裨益。

II. 上世纪研究之概况

“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这一课题的现代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对新世纪这一课题的研究进展做回顾与反思，自然要以上世纪的研究状况为参照。因此，有必要在此先对上世纪研究状况做一简要概述²⁾。

“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课题研究在上世纪所取得的成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六朝佛教对晋宋山水文学观的影响。晋宋之际山水文学思潮的兴起，与佛教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学者们认为，佛教“法身”、“形神”观念对“山水以形媚道”文艺观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而这正是山水文学思潮兴起的重要因素。此外支遁、慧远对山水的理论阐释及山水文学的实践，对当时山水文艺观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³⁾。

- 1)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211”工程项目之子项目“佛理禅思与中国文论的诗性精神”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 2) 详情可参高文强：《二十世纪佛教与六朝文学批评研究述略》，《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 3) 参见张国星：《佛学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学术月刊》1986年第11期；蒋述卓：《支遁与山水文学的兴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蒋述卓：《佛教与晋宋之际的山水文学思潮》，《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4辑；齐文榜：《试论慧远对山水诗歌的贡献》，《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齐文榜：《试论佛教僧徒的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姜光斗：《论佛教思想对谢灵运之山水诗文的影响》，《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李炳海：《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学

第二,六朝佛教对永明声律论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一文首次提出四声的发现是受佛经转读影响。其后逯钦立先生《四声考》认为:“四声论之所以起,端赖四声‘纽’之发明。”并详细论证了“纽”与佛教悉昙之“体文”之关系。香港饶宗颐先生则认为陈氏所言汉语四声来自对围陀三声类比的说法不确,他也认为四声的发现当是受天竺悉昙影响所至⁴⁾。

第三,六朝佛教对梁陈宫体文学观的影响。学者们认为,当时文人对宫体新变的提倡,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迷恋欲色而不返,他们对宫体文学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如佛经一样演欲色异相以说法,达到劝谕警世的目的,而这正是为配合萧梁统治集团以佛法化俗的政治行为。因此,佛教对当时宫体文学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⁵⁾。

第四,六朝佛教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佛教对刘勰的影响。学者们考察的重点是对刘勰依居佛门及其护佛论文《灭惑论》的辨析⁶⁾。其二是佛教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学者们认为,《文心雕龙》的结构可能受到佛教因明学的影响,而佛教《成实论》的结构对《文心雕龙》的创作可能也有一定启发。从内容上看,《文心雕龙》的宗经思想,沿波讨源、原始要终、惟务折衷的论文原则,文质、通变、虚静等

术研究》1996年第2期;陈道贵:《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张伯伟:《山水诗与佛教》,《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版。

- 4) 参见饶宗颐:《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略论——四声外来说平议》,见《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论四声与悉昙之关系兼谈王斌、刘善经、沈约》,中华文史论丛1985版。
- 5) 参见汪春泓:《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张伯伟:《宫体诗与佛教》,见《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6) 参见王元化:《灭惑论与刘勰前后期思想变化》,《历史学》1979年第2期;杨明照:《刘勰灭惑论撰年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辑;张少康:《刘勰为什么要“依沙门僧祐”》,《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李森:《关于〈灭惑论〉撰年与诸家商兑》,《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马宏山:《对刘勰“家贫不婚娶”和“依沙门僧祐”的看法》,《文心雕龙学刊》第1辑;陶礼天:《刘勰〈灭惑论〉创作诸问题考论》,《文心雕龙研究》第4辑。

文学观念及范畴，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佛教的影响⁷⁾。

第五，六朝佛教对文学批评范畴的影响。佛教名相对文学批评范畴的影响实应为佛教影响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20世纪此方向之研究成果较少。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佛教形、象理论对文学形象理论的影响，佛教的禅学思想对虚静说的影响，此前曾提及的对文质、言意、通变等范畴的影响亦属此列⁸⁾。

第六，六朝佛经翻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蒋述卓所著《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颇为深入，蒋著较详细地论证了佛经翻译理论对当时文学批评之文质观、言意观、文体观产生的影响，以及佛经翻译对齐梁浮艳文风的影响。张少康所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也指出了佛教徒对佛经语言言意关系的讨论对当时文学批评言意观“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并指出佛经翻译的文与质、繁与约的问题，对当时文学理论都有一定影响。

此外，六朝佛教对文学批评其他方面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如佛教禅法对艺术构思理论的影响，佛教语言观对南朝文学批评语言的影响，这些探讨都有一些独到见解值得注意⁹⁾。

纵观20世纪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之研究，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果，但就六朝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整体来看，此课题之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一环。在看似大量的成果中，不少仍停留在印象式的概说和

7) 参见兴膳宏：《〈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4年版；汪春泓：《关于〈文心雕龙〉之佛教渊源的新思考》，《文心雕龙研究》第2辑；陶礼天：《刘勰文质观与佛经翻译之文质论》，《文艺研究》1999年增刊；[美]蔡宗齐：《〈文心雕龙〉与儒道佛家的中道思维》，《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8) 参见敏泽：《论魏晋至唐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兼论佛学输入对于艺术形象理论的影响》，《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普慧：《慧远的禅智论与东晋南北朝的审美虚静说》，《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

9) 参见黄鸣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禅法与艺术构思理论》，《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6期；马现诚：《佛教言意观与南朝文论家的语言艺术》，《江汉论坛》1996年第8期。

文本的简单比附上,而缺乏材料的实证和理论的辨析。存在的不足与这一课题研究的如下特征有一定关系:

第一,研究范围的不平衡。20世纪本课题的研究范围相对较窄,主要集中于永明声律之四声说,刘勰及《文心雕龙》,山水及宫体文学观等问题,而对于六朝文学批评其他方面所受佛教影响却较少涉足。这种研究范围的不平衡使得这一课题目前的研究成绩整体上显得比较单薄零散。

第二,研究方法的不平衡。汤用彤先生论及研究佛教的方法时曾指出:“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¹⁰⁾在研究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上,同样应该“陈迹之搜讨”与“义理之默应”相结合才能得其真。而上世纪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的研究多重“陈迹之搜讨”,忽视“义理之默应”,如果仅凭直接材料来证佛教之影响,受客观条件所限,所获自然不会很多。

第三,研究者学识的不平衡。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属学科交叉性研究,应尽量求得佛学与文学批评两学科知识的平衡,然后叙事论史才能大体不失原貌。作为文学研究者,则更应该注意佛学知识的加强。上世纪本课题的研究情况正如杜继文先生所言,“随意发挥,取佛教的某些枝节文句,阐述个人的思想观念、感情爱好”¹¹⁾的趋向比较普遍。大多研究者的佛学知识较之文学知识相对薄弱,佛教文本便只能成为随意发挥的材料。若将佛学仅作为可资引用的材料加以运用,所论自然无法深入。故常常可见大而化之、泛泛而论之作。表现上看似无太多疑问,其实质则既无具体内容、又无新颖见解。

因此,欲使本课题的研究获得整体发展,作为文学研究者应该以提高佛教学识为基础,不断开拓思路和方法,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更广阔的范围,如此才能从整体上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0)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53页。

11)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序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

III. 新世纪研究之进展

进入新世纪后,“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课题的研究至今已取得不少新的成果,无论是研究的范围还是方法,都有新的进展。

(一) 对旧有研究领域之推进

新世纪以来,本课题的旧有研究领域依然是热点,成果数量占总数的大部。虽然其中不乏重复之作,但还是有一些成果将各旧有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1. 对山水文学观研究的推进。此领域之研究重点依然围绕谢灵运展开,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趋向于从微观角度论证佛教对其山水文学观的影响。马晓坤《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佛学意蕴》¹²⁾、胡遂《谢灵运诗文与般若空观及涅槃境界》¹³⁾两篇都通过对谢诗的详细剖析,指出谢灵运山水诗多通过对大自然景色的观照来实现自己的“照寂”“伏累”理论,其山水诗之内在理路多体现了触物起累、以理伏累、顿悟灭累的禅悟过程。普慧《弥陀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¹⁴⁾认为谢灵运自觉地接受了弥陀净土思想的影响,当他面对和走向山水文学和弥陀净土信仰时,他的审美观和文学创作实践即被纳入到了他的弥陀净土信仰意识结构之中。李小荣、张志鹏《净土观想与谢灵运山水意象及意境之关系略探》¹⁵⁾则通过对谢诗的详细分析进一步指出,谢灵运在山水文学的创作中,对相关山水意象的选择及意境的构建,皆受到了净土观想法的深刻影响。上述学者所论谢灵运山

12) 《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13)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4) 《学术月刊》2004年第3期。

15) 《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5期。

水诗与其禅悟理论和净土观念之详尽联系,皆能发前人所未发,推进了此领域之研究。

2. 对永明声律论领域的推进

自上世纪饶宗颐提出陈寅恪所言四声来自佛经转读的说法不确,而是受天竺悉曇影响所至后,饶氏观点已基本为学术界接受。不过,进入新世纪后,吴湘洲在《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再探讨》¹⁶⁾一文中对饶氏的否定又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大量材料的比较,认为佛经转读和永明声律论两者之间存在显而易见却一直被人忽视的联系,即二者都是与音乐有关的一种活动,所遇到的问题有很大一致性,即都是要解决字与声(词与乐)的配合问题,这是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依据。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永明声律的产生就是受到了佛经转读的影响,但完全否定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缺乏有力证据的。高文强《佛学东渐对诗歌声病观念及规则的影响》¹⁷⁾则通过对声律论创制者的佛教背景和随佛教传入的梵语诗律在中土传播的考察,认为永明诗歌声病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吸取外来诗律中的有益成份是完全可能的;并进一步通过相关材料的具体考证,指出永明声律论中的不少诗病概念和诗律规则都与梵文诗律有着渊源关系。此文为佛教影响永明声律论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途径。

3. 对宫体文学观领域的推进

佛教对宫体文学观到底有多大影响?上世纪之研究基本持“佛教是宫体文学观形成的主要因素”之观点。新世纪里,归青《佛教与宫体诗关系新探》¹⁸⁾是一篇对本领域推进较大的一篇文章。文章对前人所论佛教与宫体文学观之关系作了较全面梳理与辨析,认为佛教对宫体文学观形成的影响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这种影响又不宜高估,它并非宫体文学观形成的主要

16) 《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

17) 《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

18) 《学术月刊》2008年第7期。

因素；影响宫体文学观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人性的需求和中古诗歌自身发展的逻辑。此文对佛教与宫体文学观关系的定位客观而中肯，纠正了一些上世纪研究中存在的过度阐释的偏差。此外，刘林魁《佛教二谛思想与宫体文学理论》¹⁹⁾认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作为宫体文学观的主导理论，其形成受到了齐梁时期兴盛的佛教二谛论中真谛、俗谛二元思想的影响。此文为本领域研究又提供了一份新观点。

4. 对《文心雕龙》领域的推进

佛教与刘勰及《文心雕龙》之关系在新世纪依然是本课题研究的中心和热点。新世纪研究对本领域的推进，可以从两方面来介绍。

其一是佛教与刘勰之关系。上世纪研究中此方面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不过，本世纪周绍恒《〈灭惑论〉与刘勰依沙门僧的关系》²⁰⁾一文对刘勰与佛教关系又做出了新的论证。他首先以《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序》“年逾知命”、“三纪于兹”等语及《高僧传》中的有关记载为据，推算出《灭惑论》必定是撰写于齐建武五年(公元498年)之前；然后又以《释〈三破论〉》、《灭惑论》等的有关文字为据，推论出《灭惑论》是撰写于齐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刘勰还未“依沙门僧”之前，并认为它是刘勰能进入定林寺为释僧“打工”即佐其编撰经藏的“资格证书”。此外，高永旺《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²¹⁾一文对刘勰佛思想的探讨也颇有新意。他认为，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

其二是佛教与《文心雕龙》之关系。新世纪此方面研究与上世纪相比，更趋实证化与逻辑化，因此一些观点更具合理性。

在范畴方面，普慧《〈文心雕龙〉审美范畴的佛教语源》²²⁾对《文心雕

19)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0) 《怀化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1) 《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2) 《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龙》中不少术语与佛教的关系做了详细考辨,对术语所受佛教影响的方式做了合理归类。他认为这些术语中,有直接从佛教哲学中引入,保持其原有语义的,如般若、圆通、物色;有根据佛教原意又加以创造组合,形成既有佛教哲学基础又有文学审美功能的双重范畴的,如性灵、体性;有原为中国本土概念,加入了佛教内容,在进入文学领域之后,成为重要的文学审美范畴的,如虚静、原道等。冯国栋《刘勰的“虚静”说与佛家的禅学》²³⁾也通过刘勰师承渊源和作品的详细考察,论证了刘勰与佛教禅学有密切的关系,然后进一步指出,刘勰是吸收禅学的内容,将老庄本体论虚静说发展成为文学创作虚静说的。

在折衷方法方面,汪春泓《佛教的顿悟和渐悟之争与刘勰的“唯务折衷”》²⁴⁾、高文强《试论佛教论争对刘勰折衷方法的影响》²⁵⁾为《文心雕龙》“唯务折衷”方法的形成与佛教之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汪春泓认为,刘宋佛教顿悟与渐悟之争对刘勰有一定影响,刘勰在这场论争中的立场基本与道安、慧远等一致,持折衷的观点,而这对于其文章学的形成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文心雕龙》大致上是以折衷顿、渐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其文章学中种种矛盾与问题的。高文强也认为,自东晋慧远以折衷之法调和佛儒关系后,佛教论争中折衷方法的大量实践,为刘勰在《灭惑论》中折衷论佛以及在《文心雕龙》中折衷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神学思想方面,普慧《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佛教神学思想》²⁶⁾在全面考察了刘勰相关材料后,认为刘勰在《灭惑论》中所确立的佛教神学理论,其实已渗透入《文心雕龙》之中,《文心雕龙》虽是一部有关文章写作之法的专著,但因浸透着佛教神学的思维框架,故而思路开阔,条理明晰,谈论文艺,包揽宇宙,总括人心,颇合艺术审美思维之要求。张少康、笠征《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思想的关系》²⁷⁾也指出,《文心雕龙》中的

23) 《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

24) 《南开学报》2003年第3期。

25)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6) 《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

“神理”说意思是“神明的原理”,这与他的佛教神学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5. 对佛学范畴与文学批评领域的推进

此领域在上世纪的研究较为薄弱,本世纪以来此领域之研究依然并不繁荣,但还是有若干成果对此领域有所推进。“神”作为六朝佛教的重要范畴,其对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影响在上世纪研究中已有广泛讨论。新世纪中张晶《佛性论之于南北朝的美学观念》²⁸⁾、《“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²⁹⁾二文再次对“神”范畴在六朝的突出地位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他通过深入分析慧远、宗炳、谢灵运等人的佛性论思想,指出了文艺领域里对“神”的重视与佛性理论、“神不灭”思想的内在关系。詹志和在《佛教影响与魏晋时期美学精神转型》³⁰⁾也指出,佛教心性理论激发了魏晋文人具有审美创造原动力意义的自由意识,佛教形神观中的重神倾向促成并强化了审美艺术思维中“贵神似,重写意”的审美追求。

6. 对佛经翻译与文学批评领域的推进

孙旭辉《中古语言文学观及审美意识发展的佛禅理路》³¹⁾深入分析了中古佛经翻译中的语言观对六朝审美意识的影响,对此领域有所推进。她认为,佛教在中古的接受可分为“以经传理佛”、“格义佛教”、“以玄释般若”三个阶段,各个阶段佛经翻译中所体现的语言文学观的联系反映了三者间的相互发明,而般若佛教作为新变因素对此期语言文学观念及审美意识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它直接促使中古审美经验进入“顿悟、直观”的阶段。

27) 《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8) 《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

29) 《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

30) 《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

31) 《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二) 对新有研究领域之开拓

新世纪本课题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开拓性成果,不过,数量并不占多,而且相对零散。因此,我们将其归纳为三大方面来介绍。

1. 文学批评范畴领域

从本课题20世纪以来的研究可以看出,此领域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难点,但也恰是应着力发展的一个方向。刘艳芬《试析六朝诗学韵范畴的佛教影响因子》³²⁾和《佛教“镜”意象意蕴及其对六朝诗学的影响》³³⁾二文对此领域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对于“韵”范畴,她指出,韵于六朝时作为美学、诗学范畴诞生,外来佛教思想对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声音之韵美的发现即得益于佛经的传译;人物风韵之美则受到佛教涅槃佛性论的影响和启发;诗学之韵则受到佛教语言观悖论的影响。佛教及其思想的不断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韵范畴的意义演变。正是佛教思想的影响,韵才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诗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对于“镜”意象,她认为以谢灵运诗为代表的六朝诗歌因吸收了佛教镜意象“空”的神髓,才展现出了独立独特的审美气象;而唐宋诗词则兼蓄了佛教镜意象内涵的“空”和道家镜意象的“静”,而走向了繁荣发展的顶峰。

2. 文学批评观念领域

新世纪本领域的研究已不再限于山水、宫体等文学观,在其他方面也开始了开拓性进展。

(1) 新变文学观。对晋宋之际文学的趋新求变,前人更多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寻找原因,高文强所著《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³⁴⁾第三章《新观变与佛教》则认为,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

32)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33) 《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34) 《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思想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这种求新文化心态对文学的趋新求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 尚俗审美观。宋齐之际文学由雅趋俗，文学风尚的转变有着多种原因，高文强《论永明士人对尚俗审美观之接受与佛教之关系》³⁵⁾一文认为在此转变过程中，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一方面，佛教在文化心理上对士庶差异的消解，有助于永明士人对庶族阶层所发动的审美俗尚的接受；另一方面，佛教对文化世俗化的催动，也为审美俗尚在永明士人群体中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3) 六朝文论精神。这是从更加注重从形而上的层面追寻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袁济喜《论六朝佛学对中国文论精神的升华》³⁶⁾一文从宗教哲学视角切入，认为佛学从宗教境界的层面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思想境界，使文艺精神具有了更深的形而上意蕴，对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愈趋深邃，并直接促成了《文心雕龙》的诞生。詹志和《佛教影响与魏晋时期美学精神转型》³⁷⁾也指出，佛教在魏晋时期促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转型，一方面，佛教心性理论激发了魏晋文人具有审美创造原动力意义的自由意识；另一方面，佛教般若学促使在审美活动中起着价值导向作用的真实观，由注重客观真实上升为注重以主观真实为重要内容的艺术真实。

3. 僧人文学批评领域

六朝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僧人一直是被忽视的一个群体，而他们的文学批评理论对其时之文学创作及批评都有一定影响。曹虹《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³⁸⁾便指出，从文学观的角度看，慧远对于文辞、文体、感

35)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3辑。

36) 《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

37) 《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兴、形象等问题都颇有见解,而且体现在其染翰缀文的实践之中。如其对于文采的重要性,便是置于文与义或文与质的辩证关系中来把握;再如其对“兴”的理解,他重视悟理过程中“感”的方法,也都涉及到文学与玄理如何结合的时代课题。高华平《南北朝佛教僧侣的诗学成就》³⁸⁾也指出,佛教僧侣的诗学成就,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它领导着当时绮靡浓艳的诗风,而且实际上还是当时诗歌声律理论的最早的一批发明者与实践者;另一方面,南北朝中国佛僧侣的诗歌创作,扩展了中国诗歌的固有领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诗歌的表现技法,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IV. 新世纪研究之评价

“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在新世纪的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取得的成果也颇为丰富,在上世纪研究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从整体情况来看,新世纪本课题的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 研究群体逐步形成

一项课题研究的广度深度如何,与这一课题的研究群体有着密切关系。与上世纪本课题研究群体游移不定不同,新世纪以来本课题的研究群体开始逐步稳定,并已出现若干专业群体(如在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高校已有相关的硕博士点或研究方向)。研究群体的稳定及专业化,对本课题研究开拓与深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38) 《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39)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二) 研究视野逐渐开阔

研究群体的逐步稳定和专业化,促进了本课题研究视野的逐渐开阔。新世纪以来本课题的研究,已逐步走出过于倚重“陈迹之搜讨”的研究模式。不仅开始通过“义理之默应”来探寻佛教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能够引入更多视角来考察佛教对文学批评影响的发生和结果,从而大大丰富了本课题研究之方法。

(三) 研究范围更为广泛

研究视野的开阔可以直接促使研究范围的扩大。新世纪以来本课题研究范围开始逐步向六朝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扩展。一方面,传统研究方向诸如声律论、山水文学观、宫体文学观,以及《文心雕龙》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新的研究方向诸如新变文学观、尚俗审美观等也在不断开拓。此外,在具体研究中更趋向细密化,这也使研究范围向更深层扩展。

新世纪近十年来本课题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就文学批评史的整体研究状况来看,本课题还是一个比较冷的领域,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相对较少。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本课题研究依然存以下不足。

(一) 对文人接受佛教状况在佛教与文学批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不够。

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的研究,其思路大体上都是将文人作为一个被动角色,从佛教传播角度来探讨佛教文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不同途径对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而极少将文人作为文化主体,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考察文人与文学批评是如何受到佛教影响的。作为文化传播的佛教与文人接受视域中的佛教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而在影响文学特别是文学理论方面,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一些。长期以来,偏重传播视角的研究方式,往往忽略了作为文学主体的文人在佛教影响文学批评过程中所存在的重要作用。研究者往往更喜欢从佛教文献与文学批评

文献的比较中判别两者的影响关系,而不太愿意从观念层面探讨两者影响的存在,因为对观念影响的考察常常会显得过于抽象,而很难有实证之感。的确,许多观念的影响往往并非直接反映在文学理论之中,它常常是通过影响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审美观,再折射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念之中。在这种颇为曲折的影响途径中,文人对佛教的接受显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前人们对这一曲折研究思路的忽视正是研究中对接受视角忽视造成的结果。

正如荷兰学者许里和在其著作《佛教征服中国》中强调研究早期佛教史“详细分析中国人对外来教义的反应”显得尤为重要一样,研究六朝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时,细致辨析文人对佛教的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接受的角度来探讨六朝文人对佛教传播所做出的各种回应,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佛教在文人群体中所表现的选择性传播的内在原因,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层的观念因素方面去追问佛教文化是如何影响六朝文学批评的。

(二) 对僧人群体在佛教与文学批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不够。

新世纪的研究中虽然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僧人群体与文学批评之关系,但对于这一群体在佛教与文学批评关系方面的影响作用,研究还远远不够。东晋之后佛法隆盛,佛教本以佛、法、僧为“三宝”,“佛”与“法”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常常是以僧人的实践与宣讲为承载方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僧人就是佛教信仰的具体代表。因此,作为寺院僧众领袖的高僧,便常常成为在家信仰者皈依的对象。于是,文人与名僧交游,便成佛教兴盛时期士林中的普遍现象。名僧与文人交往过程中,不仅宣传佛法,同时也常常参与到文学创作与批评之中,如支遁、慧远便有不少诗作留传下来,钟嵘《诗品》下品中也列有齐惠休、道猷、宝月三人,可以说僧人文人化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对佛教影响文学批评必然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刘跃进《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一文中所说:“这些文化僧侣对于文学界的影响,主要还不是他们自身的创作,更重要的还是佛教思想对于中古诗律演变、中古文学体裁、题材以及中古文学思

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⁴⁰⁾目前研究对此显然重视不够。

(三) 对佛学东渐造成的词义流变在佛教与文学批评范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不够。

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扰着不少学者，即史载“刘勰为文长于佛理”，然而全书却“仅在个别场合使用了佛书中的术语”。这一问题同样困扰着20世纪以来本课题的研究者。究其原因，就是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仅停留于考察佛教术语对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这种以寻找佛书术语来考察佛教对六朝文学批评范畴影响的方法，显然忽视了外来观念影响范畴术语的复杂性。六朝一向被视为汉语转折的关键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佛学东渐为汉语提供了大量新词汇、新概念。新词汇、新概念的产生并非简单地引入，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有照搬原音，或略有改造的音译词；有音译佛教术语与汉语词相合而成的“梵汉合璧词”；有用汉语固有的造词材料，根据汉语的造词方法与梵语词所概括的内容构成的意译词；有利用汉语的固有词来表示佛教的新内容的“佛化汉词”，等等。因此，许多汉语术语随着佛教传播，其固有内涵都或多或少地发生着转变，或直接成为佛教术语，或在其固有内涵中融入了新的成份。所以，详细考察词义流变情况对探寻佛教影响文学批评范畴的途径会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此方法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V. 结语—新世纪研究之展望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本课题的研究已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研究情况的梳理与总结，可以看出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们认为，今后“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之研究在方法上一方面要继续将“陈述之搜讨”与“义理之默应”相结合；另一方面，应更加重视引入文字学与语言学的方法与成果，来考辨和寻绎佛教影响六朝文学批评范畴观念的路

40)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径和方式。而在研究方向上,应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将文人接受佛教纳入到佛教与文学批评二元影响关系之中,形成佛教—文人—文学批评三元研究模式;另一方面,应重视僧人群体在三元研究模式中的复杂作用。如此,才能使本课题的研究获得更广更深地发展。

<参考文献>

-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高文强,《二十世纪佛教与六朝文学批评研究述略》,《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高文强,《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普 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

<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n Buddh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Six Dynasties had got plentiful production in 20th century. But the area of these researches is incomprehensive and professional students are less. In 21st century, the researches on this realm get much innovation and more new production. Not only is the realm getting more and more professional students and production but also eyeshot and area are more abroad. It will provide benefit for the research of this subject by way of turning over to think its achievement and insufficiency.

Key Words : Six Dynasties, Buddhism, literary criticism, turn over to think

